

全球智库半月谈

新兴市场国家金融溢出效应引关注

美国大选笔记：大选年后的贸易政策

TPP 的实质——“看今日之世界，竟是谁家之规则”

投资与保护主义：G20 峰会前概览

G20 应为全球化制订新公约

中国私人投资增速放缓：解读相关官方数据

本期编译

安婧宜

郭子睿

侯书漪

黄杨荔

李笑然

申劭婧

沈仲凯

伊林甸甸

张麟

张舜栋

朱子阳

（按姓氏拼音排序）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国际战略研究组

《全球智库半月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主编的中国社科智讯数据分析报告的组成内容，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和国际战略研究组为您提供。

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主任	张宇燕		副主任	何帆
首席专家	张斌	开放宏观		
团队成员	刘仕国	欧洲经济	徐奇渊	中国经济
	吴海英	对外贸易	曹永福	美国经济
	冯维江	新兴市场	肖立晟	国际金融
	高凌云	对外贸易	熊爱宗	国际金融
	梁永邦	宏观经济	杨盼盼	国际金融
	常殊昱	国际金融	侯书漪	科研助理
	安婧宜	科研助理		

国际战略研究组

组长	张宇燕		副组长	何帆
召集人	徐进		协调人	彭成义
团队成员	李东燕	全球治理	袁正清	国际组织
	邵峰	国际战略	徐进	国际安全
	薛力	能源安全	欧阳向英	俄罗斯政治
	黄薇	全球治理	冯维江	国际政治经济学
	王鸣鸣	外交决策	高华	北约组织
	卢国学	亚太政治	王雷	东亚安全
	彭成义	中外关系	徐秀军	全球治理
	田慧芳	气候变化	李燕	俄罗斯政治

任 琳	全球治理	丁 工	发展中国家政治
赵 洋	科研助理	刘 畅	科研助理
周 乐	科研助理		

联系人: 侯书漪 邮箱: iwepceem@163.com 电话: (86)10-8519 5775 传真: (86)10-6512 6105

通讯地址: 北京 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1543 邮政编码: 100732

免责声明:

版权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和国际战略研究组所有, 未经版权所有人许可, 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上网和刊登, 如有违反, 版权所有人保留法律追责权利。《全球智库半月谈》所编译的文章, 仅反映原文作者的观点, 不代表编译者、版权所有人或所属机构的观点。

目 录

世界热点

新兴市场国家金融溢出效应引关注 3

导读：新兴市场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在过去的 20 年显著上升。越来越多的新兴经济体更多地影响了世界，在这些因素中，作者认为新兴经济体的金融一体化相比贸易因素更为重要。而这些国家较高的企业杠杆率和共同基金放大了溢出效应。发达经济体的政策制定者应该关注来自新兴市场未来的溢出效应，尤其是来自中国的。

英国脱欧与欧盟财政约束的放松 7

导读：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的财政赤字规模未达到欧盟委员会的政策目标，但欧盟委员会却做出决定，对违规的西葡二国免于惩罚。作者认为，欧盟委员会的这一决定背后暗含着对脱欧风潮扩大化的担忧。

美国大选笔记：大选年后的贸易政策 9

导读：美国工人的工资陷入长期停滞，收入不平等也在加剧。贸易政策已经变成美国公民大选关注的焦点政策，不管哪一位候选人取得成功，都将反思和改变当前的贸易协议。尤其是 TPP，可能会成为最先被考虑解决的协议。

老龄化制约欧元区经济 11

导读：在人口老龄化的同时，欧元区的劳动力也越来越老了。这可能导致未来几年生产率的增速会有所下降，为政府提出了又一个政策挑战。本文主要分析了欧元区劳动力老龄化的影响，和采取的政策措施。

全球治理

TPP 的实质——“看今日之世界，竟是谁家之规则” 15

导读：本文认为，二战以来一直由美国主导而制定的世界规则体系正面临威胁，中国开始希望成为亚太地区的规则制定者。TPP 在劳工、数字贸易以及国有企业定位等方面维护了美国的利益，并且不同于中国的相关主张。TPP 将使美国保持规则制定者的身份。

TTIP 已经寿终正寝？ 18

导读：近期，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宣布年内讨论是否批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额协议”（TPP）。然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与欧洲各国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IPP）谈判陷入僵局，甚至有“难产”的危险。笔者讨论了目前 TIPP 谈判面临的困局，并提出了可能的解决办法。

G20 专题

在 G20 会议中重提全球化进程 20

导读：近年来，伴随着全球化产生的诸多问题，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内都普遍出现了声势浩大的反全球化运动。面对这一局势，各国领导人应该如何携手努力，重建人民对全球化的信心？本文给出了分析。

投资与保护主义：G20 峰会前概览 22

导读：20 国集团贸易部长采纳了全球投资政策制定的 9 条指导原则。本文将介绍全球贸易预警组织(GTA)的最新报告，以阐释为什么 20 国集团过去的作为并不支持刺激经济增长的新目标。

G20 应为全球化制订新公约 26

导读：2016 年 8 月 3 日英著名智库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网站发表文章《G20 应该为全球化确立一个新的公约》，作者对目前全球化中的一些弊端和缺陷进行了描述，并对 G20 可能在解决这些方面问题的能力抱有希望，给出了相应的建议。

聚焦中国**加拿大邀中国共舞 28**

导读：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于周一离开渥太华，开始对中国的第一次正式访问。这趟旅程对于希望加强双边合作的两国来说都非常重要，而且结果也将对美国，即世界最大经济体和中加两国的战略合作伙伴，产生重要影响。

中国私人投资增速放缓：解读相关官方数据 30

导读：2016 年上半年，中国国家统计局的官方数据显示中国的私人投资严重下滑。但是，中国私人投资放缓似乎不像数据显示得那么严重，因为中国将除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之外的所有投资都算做了私人投资部门。然而，2015 年夏季政府对股市调控，使得这种分类方法下的私人投资下滑被过分夸大了。

本期智库介绍 32

新兴市场国家金融溢出效应引关注

Gaston Gelos, Jay Surti /文 朱子阳/编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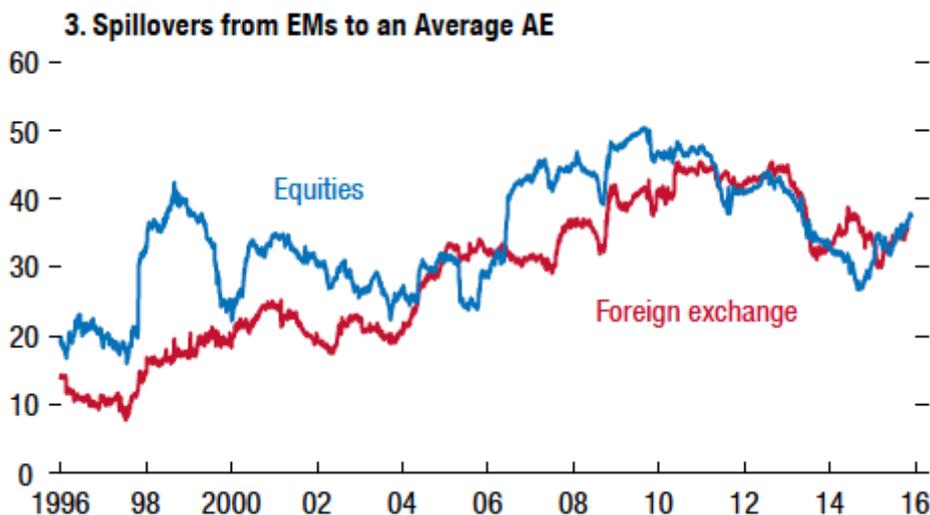
导读：新兴市场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在过去的 20 年显著上升。越来越多的新兴经济体更多地影响了世界，在这些因素中，作者认为新兴经济体的金融一体化相比贸易因素更为重要。而这些国家较高的企业杠杆率和共同基金放大了溢出效应。发达经济体的政策制定者应该关注来自新兴市场未来的溢出效应，尤其是来自中国的。编译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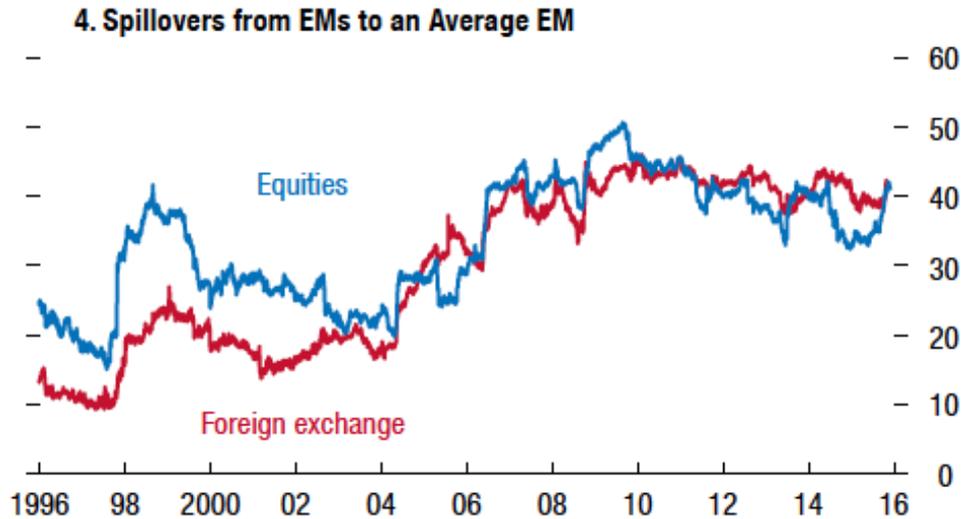
当资产的价格波动传导而引致其他资产价格的变动，我们把这一效应视作金融溢出效应。他们可以同时导致两种效应，其一，传递出正常的价格信息，其二，导致金融摩擦过度波动。近日，在新兴市场的金融波动似乎已经得到了广泛的传播，甚至影响了那些没有危机或危机迹象的国家。例如，中国股市在 2016 年 1 月 6 日的下跌影响了遍布世界各地的资产市场。IMF 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系统地考察了来自新兴市场的金融溢出效应，以及他们变化的根本原因、演变和程度。（IMF2016）

为了测量溢出效应，我们借鉴 Diebold and Yilmaz (2014) 的方法，使用每日资产回报数据，并使用了向量自回归模型（VAR）进行研究。

结果表明，在过去的 20 年中，新兴市场资产价格冲击股票价格和汇率，甚至影响到了发达经济体，这几乎可以解释这些国家的收益变化的三分之一（图 1）。由于全球金融危机，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平均资产市场溢出效应已经上升了 28%。此外，新兴经济体的溢出效应比发达经济体更大，例如巴西、中国、印度和南非的金融溢出影响以较快速度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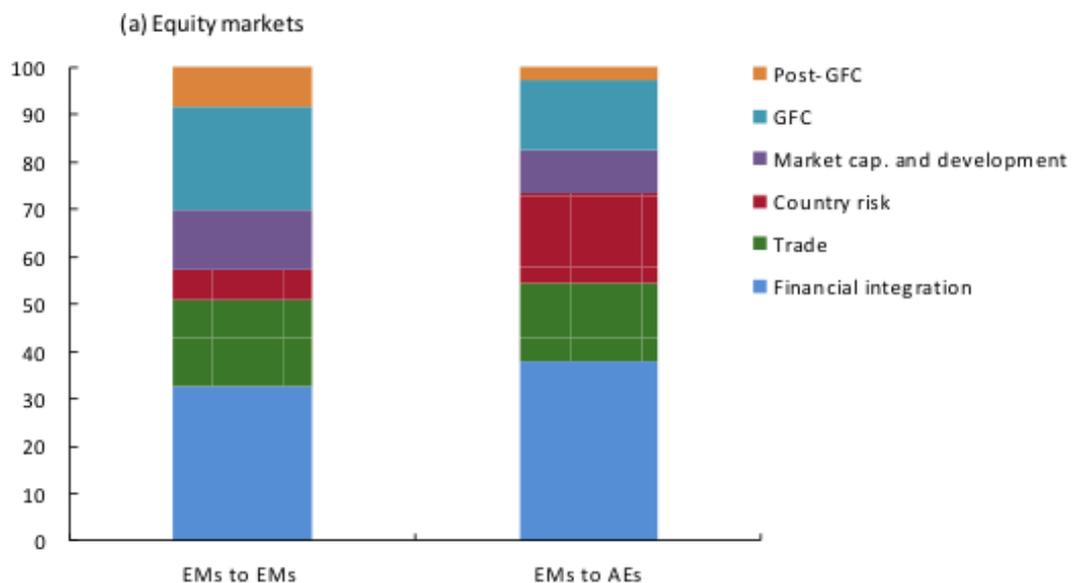
图 1 各类资产的溢出指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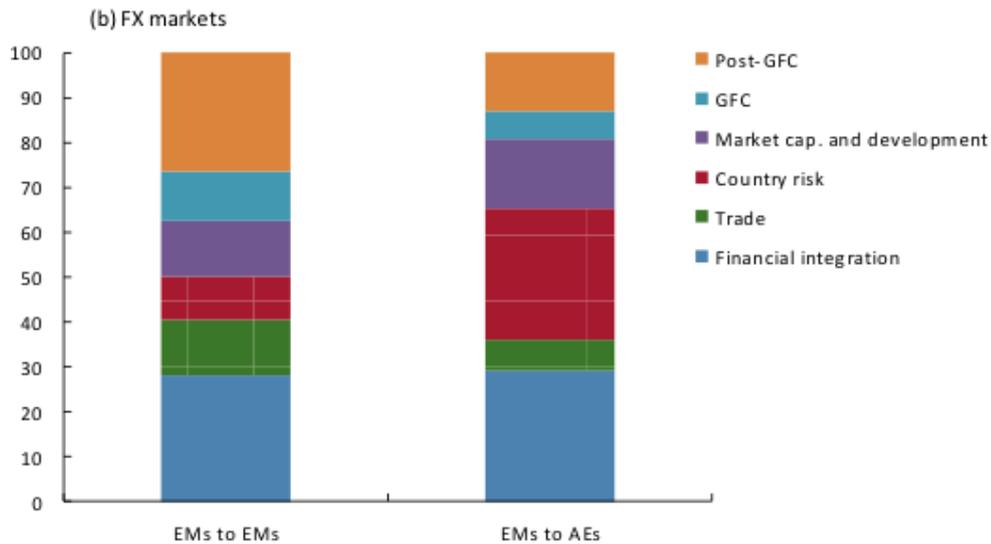




什么更重要？贸易还是金融一体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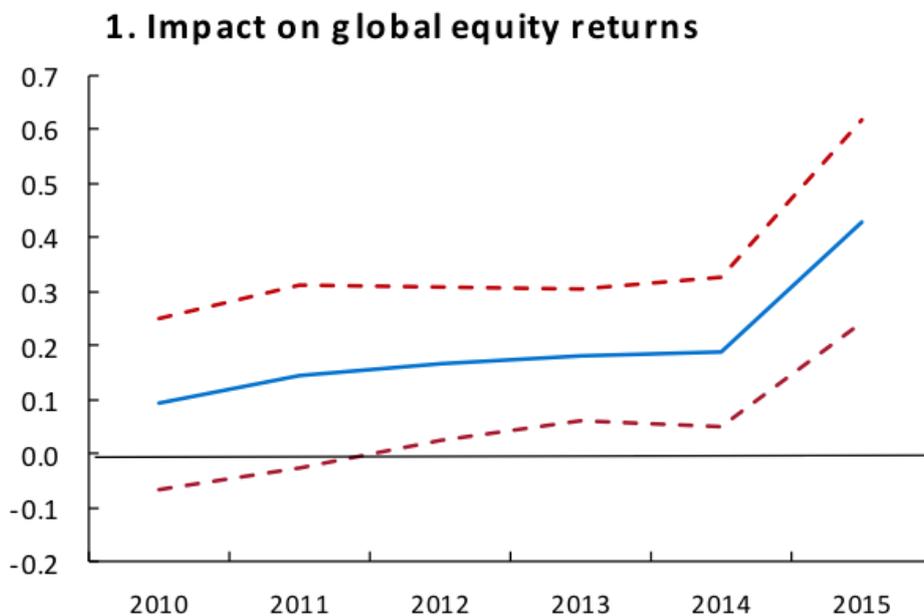
自 1990 年代中期以来，全球经济活动中的新兴市场的份额急剧上升，新兴经济体全面融入全球贸易和金融。我们发现，金融一体化是相对贸易更重要的驱动力。贸易联系可以解释股票和外汇市场变动的部分不超过 10-20%，而金融联系和金融一体化等措施可以解释接近 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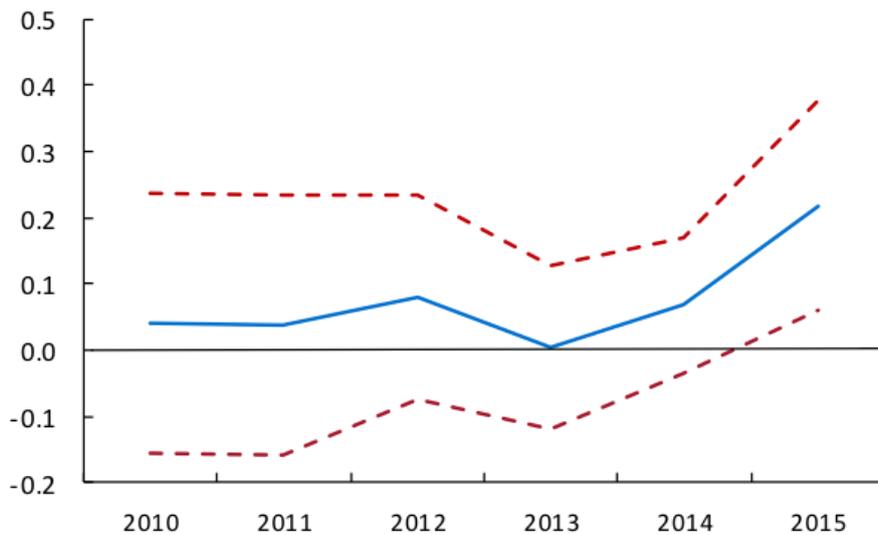


中国金融市场与世界一定程度上还是分离的，这意味着在中国资产价格的冲击还没有系统地在外国产生很大影响，但对中国经济的消息已经对外国股市产生越来越多的影响。从增长预期来衡量，中国经济的惊喜对全球股票回报率的影响，在过去的 10 年显著地扩大了超过四倍（图 2）。并在未来可能对世界产生更大影响。

图 2：中国经济波动的溢出效应



2. Impact on Asian equity returns



企业财务和共同基金流动放大金融溢出效应

我们发现，更多地依赖于外部融资的部门，尤其是一些低流动性和较高的杠杆比率的公司，更容易受到新兴市场的溢出效应。企业借贷似乎在外溢传输中扮演越来越大的作用。

此外，共同基金流向是影响金融溢出效应的另一重要因素。共同基金可以传输不同国家的金融震荡。他们通过大量调节其资产组合，从而传导溢出效应。

政策建议

我们的研究结果明确表明，当决策者评估他们的宏观金融环境，必须考虑到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重要性。我们还强调了加强国际宏观经济和宏观审慎政策合作的重要性。因此，政策制定者需要对资本流动进行更好的监管，包括银行等大型机构投资者和共同基金；获取更全面、更细致的数据。

随着中国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影响力扩大，其政策目标和实现这些目标的努力更受关注，我们必须采取一致的策略，并且敦促中国保持政策的清晰、及时沟通、透明度。

最后，考虑到关于共同基金和企业杠杆重要性的证据，这些因素可能放大溢出效应和金融市场波动，政策制定者应该确定和实施针对这些系统性风险的宏观审慎措施。

本文原题为“The growing importance of financial spillovers from emerging market economies”。作者 Gaston Gelos 是 IMF 全球金融稳定部副主管，Jay Surti 是 IMF 全球金融稳定部副处长。本文于 2016 年 8 月刊于 VOX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英国脱欧与欧盟财政约束的放松

Simeon Djankov /文 伊林甸甸/编译

导读：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的财政赤字规模未达到欧盟委员会的政策目标，但欧盟委员会却做出决定，对违规的西葡二国免于惩罚。作者认为，欧盟委员会的这一决定背后暗含着对脱欧风潮扩大化的担忧。编译如下：

英国脱欧已经开始展现出了对欧盟经济政策的负面影响。由于担心部分国家脱欧的意愿加强，欧盟委员会已经决定不对违反 2015 年财政赤字目标的西班牙和葡萄牙进行罚款。欧盟委员会有权对违反规定的会员国处以其 GDP0.2% 的罚款，这对于西葡两国而言意味着 20 亿和 3 亿欧元。而如今，欧盟委员会决定放弃这么做。

与欧盟设定的赤字缩减目标相比，西葡两国的实际情况都相去甚远。西班牙 2015 年的财政赤字规模为其 GDP 的 5.2%，2016-2018 的预测值则分别为 4.6%，3.3% 和 2.7%。而与之相比，欧盟设定的目标值分别为 4.2%，3.6%，2.9% 和 2.2%。葡萄牙的情况也不乐观——2015 年其赤字水平为 4.4%，而欧盟对其设定的目标仅为 2.7%。

另外，西班牙的政府债务与 GDP 比例值已从 2007 年的 36% 一路飙升至 2014 年的 99%，预计在 2017 年，这一比例就将突破 100% 大关，这比欧盟的 60% 目标实在是高出了不少。而葡萄牙的政府债务与 GDP 比从 2007 年的 71% 上升至 2014 年的 130.2%，而 2016 和 2017 年的预测值则分别为 126% 和 124.5%，这比欧盟目标高出一倍不止。

在长达数月的试探后，欧盟委员会最终决定，给西葡两国更多的时间以解决其赤字问题，并取消罚款。在最新的方案中，欧盟委员会要求西班牙在 2016 年将其赤字规模缩减至 GDP 的 4.6%，并在 2017 和 18 年进一步缩减至 3.2% 和 2.2%。这比完成预定目标多出两年时间，而葡萄牙则争取到了一年的额外时间。

欧盟委员会财政事务专员 Pierre Moscovici 指出，这一决定与欧盟日益衰弱的凝聚力有关：“哪怕仅仅是象征性的罚款，也会招致人民的反对。在许多人质疑欧盟价值的时候，惩罚性的措施绝不会是正确的选择。” Pierre Moscovici 的此番发言表明，欧盟对英国脱欧带来的示范作用深感恐惧，为了避免脱欧情绪进一步蔓延，欧盟甚至愿意违背自己制定的规则。

当然，欧盟委员会决定对西班牙如此仁慈，其背后也有着其他原因。在欧盟委员会中占优势地位的中右翼政党——欧洲人民党（EPP），近年来已经输掉了芬兰、希腊、波兰和葡萄牙的选举，很显然，他们不希望在西班牙重蹈覆辙。目前欧盟委员会和欧洲理事会的主席都来自欧洲人民党，而西班牙的总理也来自欧

洲人民党。或许在欧盟官员的心中，“拉兄弟一把”也是给西班牙额外优待的原因之一。

这并不是欧盟委员会首次对自己的规则出尔反尔。例如，法国自 2009 年以来多次未能达到赤字削减目标，却被接连给予延期的优待。如果一切顺利的话，这一程序有望于 2017 年被终止。讽刺的是，这正是英国脱欧的理由之一：欧盟无法做到言出必行。

本文原题为“Brexit, Spanish Elections Loosen Fiscal Discipline in the Eurozone”。本文作者 Simeon Djankov 为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PIIE) 高级研究员。本文于 2016 年 8 月刊于 PIIE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美国大选笔记：大选年后的贸易政策

Miriam Sapiro /文 郭子睿/编译

导读：美国工人的工资陷入长期停滞，收入不平等也在加剧。贸易政策已经变成美国公民大选关注的焦点政策，不管哪一位候选人取得成功，都将反思和改变当前的贸易协议。尤其是 TPP，可能会成为最先被考虑解决的协议。编译如下：

贸易政策已经变成美国公民大选关注的焦点政策，尤其是那些对工资长期停滞和收入不平等不满意的选民。他们害怕贸易进一步开放后，全球化的先进技术会迫使他们失业。虽然美国这几年的贸易政策对经济增长和就业创造带来了积极影响，但如今贸易政策使很多选民陷入深深的焦虑之中。下一届的总统如何解决美国工人的工资长期停滞和收入不平等问题将至关重要。

1、希拉里·克林顿

克林顿给贸易协议制定了很高的门槛，只有满足如下三个条件才会支持贸易协议：能够增加美国就业，能够提高美国工人的工资以及促进国家安全。这么多年的案例研究使她支持一些协议，比如美国——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协议，反对中美洲自由贸易协定。

克林顿强调，为了保护美国的就业和工人，她会拒绝糟糕和不公平的贸易协定，包括不满足增加高薪酬就业的 TPP 协议。她反对 TPP 协议的一些谈判结果，比如“原产地规则”会将协议之外的一些国家原料以最终商品的形式进入美国市场并享受优惠待遇。

鉴于当前对新贸易协议的观点分歧，对于下一届总统来说，改善当前的贸易协议执行也许更有意义。作为美国国务卿的克林顿，非常重视与欧盟的 TTIP 协议，尽管英国脱欧降低了欧盟对美国的吸引力，但 TTIP 协议的结果会给美国带来巨大的利益。

克林顿说她对贸易政策修修补补不感兴趣。她呼吁根本性地反思美国未来的贸易协议，包括更强的贸易规则执行、把更多的负担从工人转移到工会和美国政府、设立一个新的首席贸易检察官等。克林顿始终反对孤立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即便美国不签订任何新的协议，全球化的趋势也不会改变。

2、唐纳德·特朗普

特朗普说，他赞成自由贸易但他反对一些美国的贸易协定。他认为这些贸易协定是由一些无能的代表谈判而成，是以牺牲美国的就业为代价。在最近的一次演讲中，他承诺如果能够当选总统，会采取如下的步骤：退出 TPP，识别并修正每一项违反贸易协定的行为，重新谈判或者退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解决由中国和 WTO 引起的不公平贸易，对中国施加关税。而且，

他威胁对中国进口施加 45% 的关税，惩罚把制造业业务转移到其它国家的美国公司。如果 WTO 不允许，他将重新谈判加入 WTO 或者直接退出，因为 WTO 是一个灾难。

特朗普关于美国贸易政策的观点也是回归就业，但是他并没有提太多如何去实现。其中一个建议是采取关税。但他没有意识到更高的关税对美国工人尤其是贫穷家庭的影响，会进一步强化不平等的税收。最近的一个报告显示，特朗普的观点会导致美国经济更加孤立，有可能陷入更长的衰退。如失业率的上升，下降的跨境贸易和投资，个人和企业的税收下降，更大的联邦赤字和债务负担。因此，特朗普的观点会面临着可置性问题。

3、国际意义

美国下一届总统采取的贸易政策将会对美国和全球经济带来深远影响。不管哪一位候选人取得成功，都将反思和改变当前的贸易协议。也许双边和区域贸易投资协议都会设置更高的门槛，TPP 可能会成为最先被考虑解决的协议。总体来看，克林顿可能会在现有的贸易体系下，为美国工人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并为中产阶级建立安全网。特朗普的行为更加不具有可预测性，但是美国人必须做好他采取惩罚性关税的准备。而且，他的措施有可能放缓美国经济增长，甚至全球经济。此外，下一届总统不仅仅要处理新旧贸易协议问题，还要关心公众日益关注的经济不平等和不安全问题。

本文原题为“US Election Note: Trade Policy After 2016”。本文作者 Miriam Sapiro 为英国伦敦芬斯伯里的高级顾问。本文于 2016 年 8 月刊于 CHATHAM HOUSE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老龄化制约欧元区经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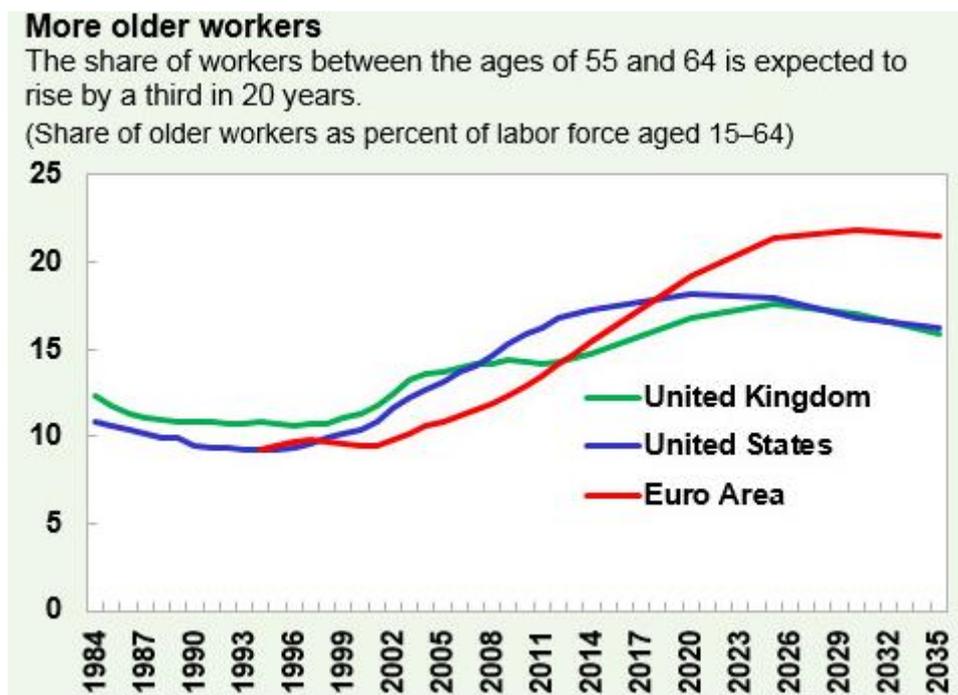
Shekhar Aiyar, Christian Ebeke 和 Xiaobo Shao /文 侯书漪/编译

导读：在人口老龄化的同时，欧元区的劳动力也越来越老了。这可能导致未来几年生产率的增速会有所下降，为政府提出了又一个政策挑战。本文主要分析了欧元区劳动力老龄化的影响，和采取的政策措施。编译如下：

在人口老龄化的同时，欧元区的劳动力也越来越老了。这可能导致未来几年生产率的增速会有所下降，为政府提出了又一个政策挑战，即如何应对经济危机后高失业率和债务等问题。

在未来的几十年里，欧元区的人口预计将会有显著的增长。这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与在欧元区处于工作年龄（15-64岁）的人口相比，退休人口的数量将有所增长；第二，也是未被证实的，劳动力的平均年龄将上升：在未来20年，55至64岁的工人的比例预计将增加三分之一，从15%增加到20%（如图1）。

图1 老年劳动力人数上升



这样的劳动力老龄化的可能影响是什么？如果不同的年龄组内的劳动力有不同的生产力水平，那么很显然，平均生产力水平将受到年龄分布变化的影响。但是往哪个方向呢？

年龄对生产力的影响有几种不同的理论。一方面，积累了多年的工作经验可以使老年劳动力更高效；另一方面，更虚弱的身体和过时的技能会降低他们的生

产率，至少在年龄超过一定的阈值之后。虽然很难统括所有行业，但在文献中的共识是，生产率是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增加，在 40 或 50 多岁的时候达到峰值，然后就逐渐降低。

经验估计

我们选取从 1950 至 2014 年的欧洲国家的样本，来研究劳动力老龄化和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在修正各种各样的计量经济学的缺陷——如反向因果关系之后，我们发现，劳动力老龄化显著降低了每名工人的产出。55-64 岁的工人的比例每增加 5 个百分点，劳动生产率下降三分之一。

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即每个工人的产出，可以被分解为所使用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量的变化，而全要素生产率，则最终衡量了一个经济体将投入转换成产出的效率。从长远来看，全要素生产率是经济增长最重要的驱动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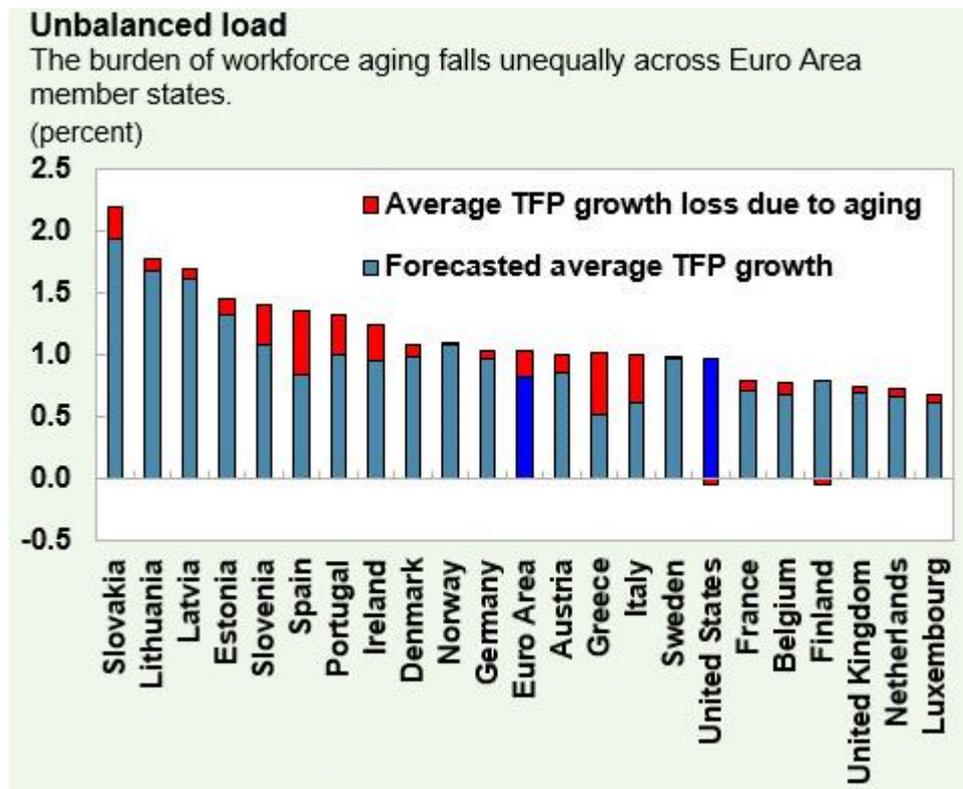
我们发现，全要素生产率是劳动力老龄化影响劳动生产率的主要渠道。特别是，55 岁至 64 岁的工人的比例每增加 5 个百分点，全要素生产率下降 2-4%。

这对欧元区国家意味着什么？

首先，老龄化将在中期到长期内给生产力增长带来相当大的影响。如图 2 所示，欧元区的平均全要素生产率增速预计为每年 0.8% 左右。这可能会再高出四分之一，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去除劳动力老龄化的影响，那全要素生产率的增幅可能会上升到每年 1% 左右。这一结果与美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美国的劳动力完全没有对老龄化的预期（事实上，劳动力预期会变得略微年轻些），因此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其次，欧元区各个成员国所承担的劳动力老龄化压力不同。令人担忧的是，一些对生产力最不利的影响会落在那些无力承担的国家，如希腊、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这些国家已经有了高债务水平和微薄的财政空间，需要生产力的快速增长以提升竞争力和降低失业率。

图2 不平衡的负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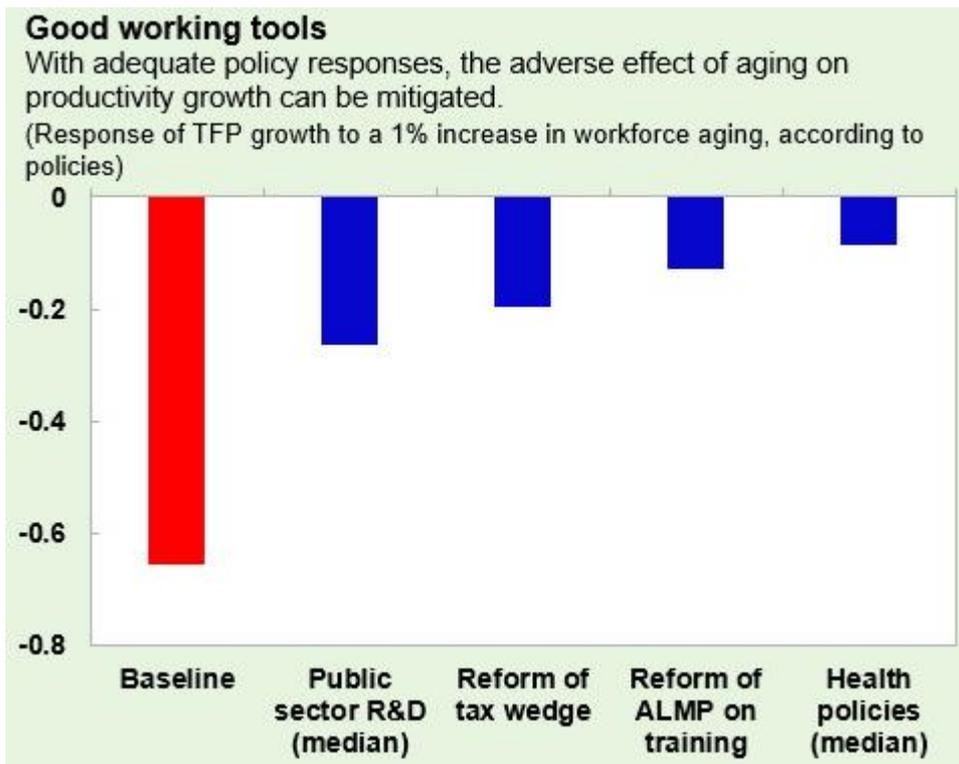


政策能做什么？

好消息是，政策可以起到作用。我们发现，一些政策可以减少劳动力老龄化对生产力增长的不利影响（如图3）。

在我们的研究中测得的健康状况是特别重要的。如果这个指标有足够的改进，就可能大幅降低老龄化对生产力的负面影响。虽然高质量的医疗保健显然有益于所有年龄组，但更老的年龄组可能更多使用医疗服务，所以不同年龄组会不同程度地受益于公共政策支持下的医保质量的提高。

图3 好的劳动力政策



减轻老龄化影响的另一个重要途径是将劳动力市场政策的重心放在劳动力培训或再培训方面。有了更好的医疗保健，这样的培训项目很可能对高级员工有不同程度的好处，因为他们的技能通常会落后于不断变化的新技术和职位要求。其他公共政策，如通过削减边缘性就业的税率来减少总收入和税后收入之间的差异，以及投资于研究和开发等也可以起到一定作用。

本文原题为“The Euro Area Workforce is Aging, Costing Growth”。本文作者是 Shekhar Aiyar, Christian Ebeke 和 Xiaobo Shao, Shekhar Aiyar 是 IMF 欧洲部的副主席, Christian Ebeke 是 IMF 欧洲部的一个经济学家, Xiaobo Shao 是 IMF 欧洲部的一个研究分析师。本文于 2016 年 8 月刊于 IMF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TPP 的实质——“看今日之世界，竟是谁家之规则”

Matthew P. Goodman /文 李笑然/编译

导读：本文认为，二战以来一直由美国主导而制定的世界规则体系正面临威胁，中国开始希望成为亚太地区的规则制定者。TPP 在劳工、数字贸易以及国有企业定位等方面维护了美国的利益，并且不同于中国的相关主张。TPP 将使美国保持规则制定者的身份。编译如下：

奥巴马在一月的国情咨文演讲中，开始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获批这场战役打响第一枪，他说：“有了 TPP，中国就不会（在亚太地区）制定规则，而我们会。”这一言论引发了争议。虽然这句话听起来没有外交精神，但奥巴马明确提出了 TPP 的一条重要思路。这条思路与大多数支持者的纯经济和战略论点不同。我们称之为“战略经济”，我们在本文中探讨它如何影响美国利益。

TPP 的战略意图是明确的。我们之前在 CSIS 上的评论中也提到，TPP 是奥巴马政府在亚太地区实施“再平衡战略”的核心。过去 70 年，美国在亚太地区扮演了至关重要的作用，TPP 的获批将帮助美国恢复和强化这一角色。

然而，TPP 的经济影响并没有支持者和反对者宣称的那么多。但总的来说，TPP 将会对美国产生巨大的利益。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在今年 5 月做了权威估计，认为到 2032 年，TPP 将为美国实际增收 5730 万美元，为 GDP 贡献 0.25 个百分点。也许游戏规则不会改变，但这将为一个每年只有 2 个百分点增长的经济体带来推动作用。而对于其他成员国（尤其是越南和日本）来说，TPP 的积极影响则十分明显，同时给美国企业提供新的出口机会。

我所说的 TPP 的“战略经济”与上面提到的两个观点有关但不一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华盛顿提出了一系列的规则条例，来保证国家之间的经济互动是开放、平等和互惠的。与此同时，华盛顿还主导建立了一系列机构来协商和推行这些规则，包括 IMF 和 WTO。我们之前提到过，这些举措可谓“一举两得”：它们不仅推动了美国经济发展，还通过鼓励其他国家加入到我们的体系中，来实现我们的贸易政策。

过去几年，以规则为基础的美国经济体系面临挑战。奥巴马总统在国情咨文演讲中提到了这一点。他并没有说中国已经自认为是一个规则制定者，但他暗示了美国面临着将规则制定者这一角色拱手让给中国的风险。实际上，中国至今已逐渐成为一个规则遵循者，遵守着（也许实践中不完全执行）IMF、WTO 和其他布雷顿森林体系机构的规则。从某种程度上讲，中国已经开始挑战华盛顿在全球经济治理上的领导地位，不再满足于仅仅遵守这些规则。

过去几年，中国已经展现出对亚太地区经济规则制定的意图和能力。建立了亚投行，发起了大规模区域性基础设施投资计划（“一带一路”），以及可以取代 TPP 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

从很多方面来看，这些倡议与该地区当前的规则大同小异，两者差别之处并没有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但在一些重要领域，中国制定的规则损害了美国的利益。在 TPP 的第三章，美国成功制定了新的规则，中国在这些方面有所不同。

我们从劳工这一章说起。TPP 规定了工会的建立和集体谈判，禁止童工，以及反对雇佣歧视等诸多原则。奥巴马政府在 TPP 中提高了劳工标准，这与我们的价值观一致，同时为美国工人提供了平等的竞争环境。

中国还没有制定类似的条例。中国的执政党从根本上反对建立独立、有组织的工会。中国一贯性的在国际劳工组织（ILO）中限制工会的自由，ILO 中很多关于组织权和强迫劳动规定并没有在中国执行。中国目前的贸易条款中没有写清劳工标准，连低于美国劳工标准的条例都没有。

数字贸易是关系到美国利益的另一个领域，而 TPP 对此提出了更高的新标准。在 TPP 的其他条款中，数据定位，数字关税，以及在大部分地区实现数据跨区域自由流动等都有明确规定。

与此相反，中国正离自由而开放的电子商务市场越来越远。例如，网络安全法律草案规定了境外数据以及境外数字产品的安全壁垒等。中国政府要求电信公司采用国家的无线技术标准，而这些标准已被国际标准组织否决。2015 年，在乌镇召开的世界互联网大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倡互联网监管上的“网络主权”，由国家制定相关规则。

中美意见不一致的第三个领域是国家在市场中的定位。TPP 史无前例地为国有企业制定了国际规则，这样可以保证这些企业只需考虑商业价值，不必兼顾营收差的子公司等等。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提供平等的竞争环境对于提升美国企业国际竞争力至关重要。

中国的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起重要作用。而中国已经开始意识到改善这些低效国企绩效的必要性，但改革之路依然缓慢。实际上，很明显改革的目标是希望国有企业少而强。2013 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但同时指出：“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的主导地位，充分发挥国有部门的主导作用，不断增加其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

美国国会在考虑 TPP 获批问题时，应想想与美国利益息息相关的劳工权利是否在全世界得到保障，世界需要开放而统一的数字市场，政府对市场的介入应

受到限制。还有知识产权保护、监管透明以及服务贸易等方面。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这些都与我们的经济繁荣和海外利益密切相关。

那么，怎样推动这些规则的制定呢？除了 TPP，还有什么能够实现这一目标？很显然中国政策制定者正在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而他们的答案往往不是我们想要的。

本文原题为“[Yes, TPP is About Who Writes the Rules](#)”。本文作者 Matthew P. Goodman 是 CSIS 政治经济学中亚洲经济的高级顾问。本文于 2016 年 8 月刊于 CSIS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TTIP 已经寿终正寝？

DANIEL J. IKENSON/文 沈仲凯/编译

导读：近期，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宣布年内讨论是否批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然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与欧洲各国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IPP）谈判陷入僵局，甚至有“难产”的危险。笔者讨论了目前 TIPP 谈判面临的困局，并提出了可能的解决办法。编译如下：

最近，美国贸易代表 Michael Froman 面对的烦心事不少。首先，参议院多数党领袖 Mitch McConnell 一改之前模棱两可的态度，宣布将于年内讨论是否批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然而，德国经济部长近期宣称，过去三年“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谈判实际上已经失败。这一说法也得到了法国的印证：法国部长亦承诺将正式终止 TTIP 的相关谈判，因为“美国不愿意让出自己的任何利益”。

TPP 与 TTIP 的处境形成了某种对比。从 TPP 的情况来看，无论参议院多数党领袖 McConnell 的动机是什么，下一任美国政府及国会很可能将 TPP 的正式批准生效作为亟待完成的重要任务之一。反观 TTIP，尽管相关谈判还未被正式叫停，但已有式微之势。其实，TTIP 谈判一开始就面临重重困难，背后牵涉太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太多无法妥协的红线，以及对实现协议所需时间和努力的预估不足。雪上加霜的是，美国和欧盟成员对于 TTIP 的态度一开始就是不对称的：美国将绝大部分精力放在 TPP 谈判之上，而欧盟各国对 TTIP 的重视却没有得到美国的同等回应。

现在，英国“脱欧”带来的巨大不确定性使得局面更加复杂，这种不确定性将为美国及英国的谈判者带来更多筹码：一旦美国与英国达成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或者英国亦加入 TPP，那么美国将在与欧盟的 TTIP 谈判中拥有更多筹码。而对于“脱欧”后的英国，与美国的协定亦有助于其在与欧盟各国的谈判中占据有利位置。

TTIP 谈判没有完全终结，但陷入了僵局，这种僵局来自谈判双方地位的不对等性。占据有利地位的国家将尽可能要求其他国家开放市场，但同时拒绝开放本国市场，这就是如今美国的情况。如果欧盟其他国家无法拥有更多谈判筹码，TTIP 谈判就难以找到突破口，美国的消费者及进口产业亦无法通过 TTIP 获得收益。

影响 TTIP 谈判成果的一个重要阻碍在于美国对海运及空运领域自由竞争的限制，叠加美国政府各类采购项目对本土企业的保护。事实上，目前美国每年有

数以万亿的经济活动由美国本土企业独享，而不对海外企业开放竞争。在至今为止的 TTIP 谈判中，美国亦没有任何意愿开放上述领域的市场。如果这一问题无法解决，TTIP 将注定无法成功。

事实上，早在 2013 年 TTIP 谈判刚刚启动时，笔者就在一篇文章中讨论了影响 TTIP 谈判成败的因素，以及达成 TTIP 谈判需要的途径与手段。笔者认为，TTIP 谈判诞生之初被欧洲寄予厚望，并非源于欧洲工商界的强烈诉求，而在于欧洲各国政府迫切需要某种象征性的“时刻”来证明欧洲经济依然有重振的希望。而对美国而言，TTIP 则类似于某种安抚，以向欧洲证明自己并没有在实施亚洲战略的同时忽略怠慢欧洲各国利益。但是，双方都缺乏某种强烈的动机去真正实现 TTIP 协议，这使谈判双方都不愿承担达成协议可能需要的妥协及政治后果。

在笔者看来，TTIP 面临诸多亟待解决的困境，这些困境在性质及复杂程度上各不相同，并且很可能需要数年去应对。因此，与其就某个单一协定规定某个单一的谈判截止日期，不如将 TTIP 谈判拆分成多个协定，分别在多个时段内逐一完成。然而，根据笔者观察，当前各国谈判者并没有采用这一思路。

谈判者可以首先归纳出所有需要谈判及讨论的事项，并对这些事项的重要性及解决的困难度进行排序，据此得到不同事项的谈判优先顺序，汇总成一套可实施的谈判路线图。

笔者认为，随着近期动荡局势逐渐稳定，美国及欧盟（包括英国）将考虑重启 TTIP 谈判。然而，最为重要的是，双方应该有真诚的意愿去推动更为开放自由的双边市场，这将为双方创造利益与价值，实现双赢。

本文原题为“RIP, TTIP?”。本文作者 DANIEL J. IKENSON 为加图研究所 Herbert A. Stiefel 贸易政策中心主任。本文于 2016 年 8 月刊于 CATO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在 G20 会议中重提全球化进程

KEVIN CARMICHAEL / 文 张舜栋 / 编译

导读：近年来，伴随着全球化产生的诸多问题，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内都普遍出现了声势浩大的反全球化运动。面对这一局势，各国领导人应该如何携手努力，重建人民对全球化的信心？本文给出了分析。编译如下：

说实话，我从未真正读完斯蒂格利茨的成名作——《全球化及其不满》。对于本书提出的论点——华盛顿共识只能使一部分人受益（比如美国与欧洲的跨国企业），而这种受益还是建立在另一部分人利益受损的基础上的（如发展中国家的工人和农民）。但是，在我看来斯蒂格利茨的观点太具有煽动性了。因此，我十年前就把它束之高阁，想着或许某一天可以把这本书退掉。

然而，后来我又想，我是不是误解了斯蒂格利茨呢？十年来，反对全球化的大军愈发壮大，许多发达国家的工人发现，全球化并没有使他们富有起来，反而是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相继发生，这使得美国和欧洲的工人们也开始反对全球化浪潮。“《全球化及其不满》的主旨是说，问题的核心并不在于全球化，而是在于实现全球化的方式方法。”斯蒂格里茨在最近发表的一篇专栏中写道：“但不幸的是，这些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如今，全球化带来的诸多不平等现象纷纷开始出现在我们这些发达经济体当中。”

这么看来，斯蒂格里茨就一点也不显得“愤青”了。毕竟，对全球化进程的质疑在各界都有广泛的共识。正如我们所熟知的，右翼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对“美国至上”情有独钟，而左翼的不少政治家也对全球化充满疑问。现如今，连中立的政治家都开始质疑全球化。今年年初，前财政部长、哈佛大学教授拉里·萨默斯就提出，与“全球治理”的精神相比，适当而理性的国家主义更适合作为国际合作的组织原则。

纽约大学斯登商学院教授、诺贝尔奖得主 Michael Spence 今年 8 月表示，之所以全球经济迟迟无法恢复到危机前的增速，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不情愿或者没有能力落实一系列政策组合”。虽然没有明确指出罪魁祸首，但很明显 Michael Spence 是在指责包括 G20 在内的一系列国际组织。而哈佛大学另一名曾预言了反对全球化声浪的经济学教授 Dani Rodrik 则认为，“全球治理”这个概念近年来实在是有点被滥用了。发达国家本身就存在不少糟糕的治理模式，且危害了全球的经济，例如美国过于宽松的银行监管。而这些问题本身就根植于各国国内，很显然并不是全球治理所能够解决的。

这也正是不少智库近年来所持有的观点。今年 9 月，G20 峰会即将在杭州召开，希望与会的 G20 国家领导人能够听进去这些观点。这次 G20 峰会将有很多

议题需要讨论，但其中最重要的议题之一，无疑是如何平复广泛出现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反全球化情绪。诚然，8年前 G20 国家领导人曾携手努力，克服了全球金融危机的考验。如今，他们也必须为低迷的全球经济给出答案。

土耳其前财长，现任布鲁金斯学会副主席的 Kemal Dervis 近年来时常发声，力挺全球化和全球治理。他在今年 8 月发表的评论中表示，尽管全球化遭遇了不少挫折，但如果我们就此放弃全球治理的努力，那后果将会是灾难性的。试想，如果不通过全球治理，我们要如何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打击跨国逃税等问题呢？

“如果我们想避免日后灾难的发生，那我们就必须早作打算，努力完善全球治理。” Dervis 评论道。

这当然没错。然而，如果 G20 和其他国际协作机制想要发挥进一步作用，他们就必须让人们觉得诚信可靠。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显然还要做不少工作。

本文原题为“Resurrecting Globalization in the Upcoming G20”。本文作者 KEVIN CARMICHAEL 为 CIGI 高级研究员。本文于 2016 年 8 月刊于 CIGI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投资与保护主义：G20 峰会前概览

Simon Evenett 和 Johannes Fritz/文 黄杨荔/编译

导读：20 国集团贸易部长采纳了全球投资政策制定的 9 条指导原则。本文将介绍全球贸易预警组织(GTA)的最新报告，以阐释为什么 20 国集团过去的作为并不支持刺激经济增长的新目标。编译如下：

当前全球贸易进程举步维艰，焦点转向中国举办的 G20 峰会对外国直接投资（FDI）的态度。两个最新事项使 FDI 成为国际商议的前沿热点：其一，今年 7 月，20 国贸易部长采纳了全球投资政策制定的 9 条指导原则；其二，今年 6 月，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15 年 FDI 流量“飙升”至金融危机以来最高水平。最新的全球贸易预警报告恰在杭州 G20 峰会前发布，批判性地评估了 FDI 的复苏、G20 对此的贡献、G20 贸易和投资政策的一致性，以及新的 G20 指导原则。

FDI 恢复了吗？

2015 年 FDI 并未明显恢复。基于联合国贸发会议的 FDI 数据，本报告发现：其一，尽管全球 FDI 流入量达到后危机时代以来巅峰，流入 G20 的 FDI 却跌出 2009 年以来的窄幅波动区间；其二，尽管全球 FDI 流入量在 2015 年上升，但仍较长期中枢低了 33%（以 1990-2005 年数据计算），流入 G20 的 FDI 较长期中枢低了 40%；其三，随着全球投资支出和 FDI 存量上升，目前 FDI 流量已低于危机时期以来峰值；其四，绿地投资已回到危机前繁荣时期水平。

G20 贸易部长们采纳了全球投资政策制定指导原则，实际上使自身与 G20 的核心目标——恢复经济增长保持一致。本报告评估了 G20 的商业决策是否对投资、进而对促进经济增长有益。

G20 真的促进了跨境投资吗？

本报告对上一轮 G20 首脑峰会以来 2000 多项全球商业政策变更进行了记录，发现：其一，2008 年 11 月以来，G20 成员国在 FDI 领域实施了 150 多项改革，不幸的是，成员国也采取了几乎同样数量的损害外国投资者的措施；其二，7 个新兴市场国家是 G20 投资政策变更的主要来源，而 G20 中更为富裕的 OECD 成员国对 FDI 领域的改革要少得多；其三，迄今为止，G20 对保护主义的崇尚造成了近 4000 项贸易壁垒和激励扭曲；其四，G20 的政策干预对投资品贸易造成了显著扭曲，目前促进投资品贸易自由化的措施总数远低于扭曲、限制性干预的数量，二者比例约为 1：10。

衡量企业面临的政策风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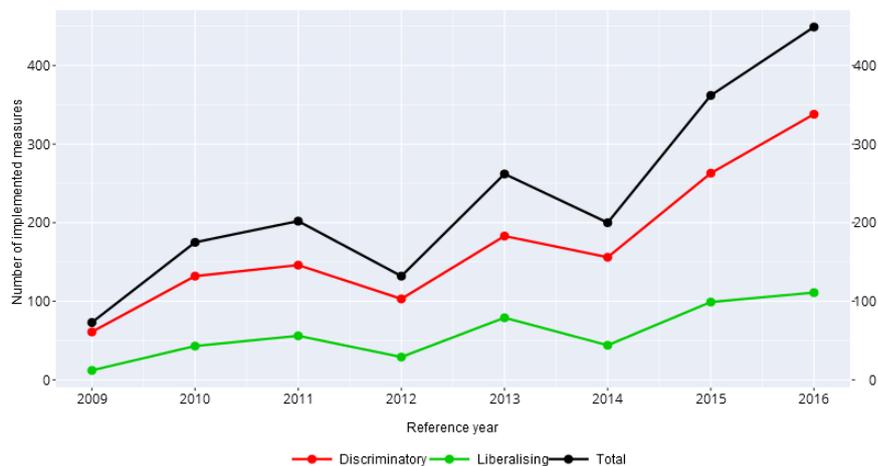
政策风险低、较为稳定的环境有助于投资发展。本报告使用衡量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指数来考察 2002-2006 年、2010-2014 年和 2015-2016 年间政策风险的影响。G20 中有 12 国的政策风险相关数据可得，其中 11 国显示政策风险较危机前持续上升。对于巴西和中国，2015-2016 年企业面临的政策风险甚至高于 2010-2014 年。

这对 G20 的投资激励意味着什么？好消息是，G20 注意到了主要的贸易问题，但坏消息是，全球投资政策制定指导原则缺乏澄清及后续进展安排，导致对其能否转变为切实可行的改革措施高度存疑。

对 G20 保护主义的最新观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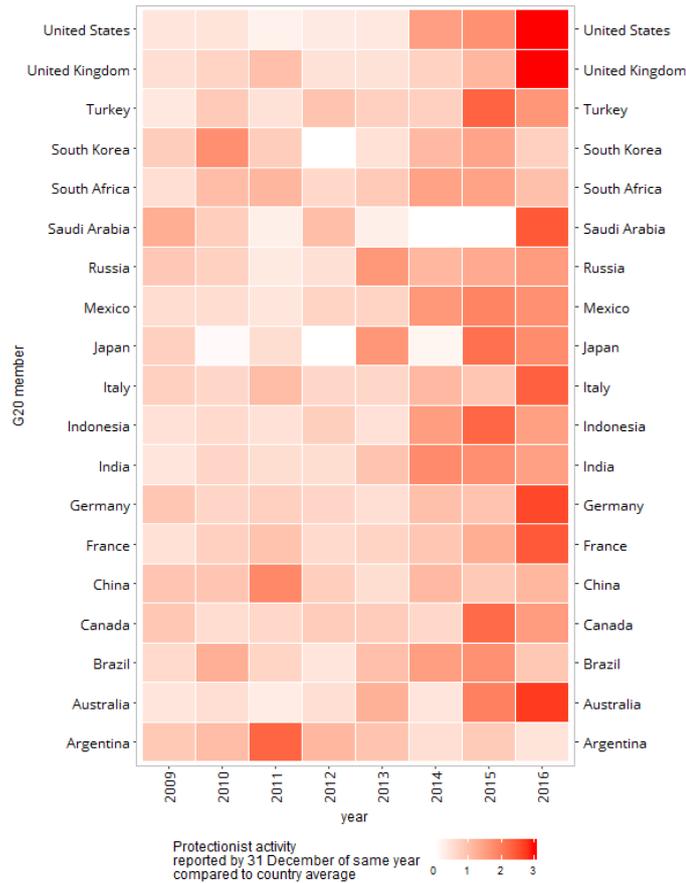
2012 年以来，G20 对保护主义的推崇有所加速（见图 1）。2016 年 1-8 月，G20 政府实施了近 350 项损害外国投资者的措施。2015-2016 年 G20 保护主义的跃升与全球贸易的停滞不谋而合。

图 1 2012 年来 G20 保护主义措施明显增加



相较金融危机初期的平均水平，2015-2016 年澳大利亚、法国、德国、意大利、沙特阿拉伯、英国、美国的商业政策环境出现了明显恶化（见图 2）。

图 2 危机时期以来，7 个 G20 成员国在 2016 年采取了更多保护主义措施



将过去 3 年每年 2000 条左右新增措施加入数据库后，本报告对危机时期以来 G20 推行保护主义的格局进行了更为全面的刻画。图 3 显示了危机以来截至 2009、2012、2014 和 2016 年 8 月 19 日 G20 成员国每季度推出的保护主义措施，上升趋势值得关注。认为 G20 保护主义在 2009 年初达到顶峰，此后在成员国自我约束、国际组织或多边规则监管下得到控制的观点基本被证伪，这些系统并未起作用。

图 3 持续上升趋势显示 G20 保护主义强化



本报告对 2008 年 11 月以来 G20 每个成员国在外国市场上面临贸易扭曲的出口份额进行了估计，由此强调 G20 领导人应认真思考保护主义：即便部分保护措施随时间推移撤销或失效了，没有一个成员国在外国市场贸易扭曲的份额有所下降。此外，这些估计强调了不同贸易扭曲的相对重要性——即便贸易救济不完全是威胁，其余政策工具的普遍使用也并不乐观。

巨大的改进空间和信誉风险

在对 G20 跨境投资政策的记录中，最令人欣慰的是，随着 G20 全球投资政策制定指导原则的实施，跨境投资政策还有很大改进空间。唯有 G20 政策发生可信的改变，降低企业面临的政策风险，才能促进私人部门增加国内和跨境投资。这或成为 G20 商业政策对解决长期贸易停滞的贡献(Baldwin and Tuelings, 2014)。

G20 贸易部长们将发现，他们很难蒙骗公司董事会成员，后者最终对投资决策负责。时间会告诉我们，G20 能否以透明、非扭曲的方式促进跨境投资，以抵制保护主义。

本文原题为“Investment and Protectionism: A pre-G20 summit briefing”。本文作者为 Simon Evenett，瑞士圣加伦大学国际贸易教授，和 Johannes Fritz，圣加伦大学研究员。本文于 2016 年 8 月刊于 VOX 网站。[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G20 应为全球化制订新公约

Alan Wheatley / 文 张麟 / 编译

导读：2016年8月3日英著名智库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网站发表文章《G20 应该为全球化确立一个新的公约》，作者对目前全球化中的一些弊端和缺陷进行了描述，并对 G20 可能在解决这些方面问题的能力抱有希望，给出了相应的建议。编译如下：

对于世界经济来说，开全球化的倒车无疑是一个确实存在的危险。尤其是当英国公投脱离欧盟和特朗普的政治表演越来越吸引眼球之际，很多人都在反对资本、商品和人员的自由流动，因为他们没有受益于此。而九月份即将在中国杭州召开的 G20 峰会可以通过向国际社会保证努力使全球化的成果得到更公平的分配来扭转这一颓势。

一个鼓励公平发展和负责任的资本主义的“杭州宪章”将给 G20 确立一个明确而又急需的目标。尽管规则是自愿性参加，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可能会负责审核，对那些无法达到既定要求的国家在以下五个领域施加压力。

劳动力市场

实际收入的停滞不前是西方大范围经济萎靡的根本原因，再加上劳动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持续下降到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水平，劳动生产力的收益与资本生产力的收益之比严重失衡。劳动占比的缩小进而与明显扩大的不平等相联系，形成了另一种认为自己被全球化扔下的怨愤思想。

政府应该自由地从可选方案中选择措施来扭转劳动收入下降的趋势。这些选项包括鼓励企业分享利润或增加富人囤积现金和回购股票的成本的税收调整；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加强劳工方的议价能力。即使是保守派政治家都在变得认为资本主义需要更加公平。新任英国首相特蕾莎已经呼吁对公司治理方式进行全面改革，包括邀请工人进入公司董事会和打压高管层的过度开支。

贸易

许多国家的公共舆论已经转为反对自由贸易。世界贸易组织已经在多哈回合谈判中让步。G20 必须阻止这种负面情绪的蔓延，以防止倒向彻底的保护主义。政府必须保证不设置贸易壁垒，给予超额补贴，或歧视外国直接投资。政府还要做出明确承诺不会故意降低其汇率以获得竞争性贸易优势。

经常性账户不平衡

减少国际经济失衡仍是一个重要任务。在需求被压抑的世界中，有大量对外贸易顺差的国家往往会受到指责，认为他们夺走了其他人的经济增长和工作。G20 应该重提把国家的经常性账户失衡率限制在 GDP 的 4% 这一理念。中国不应

为这些数字目标感到受威胁，相反，中国在去年把其顺差率从 2007 年的超过 10% 降到了和美国一样的 2.7%。

政府应该自己决定如何调控其巨额外部赤字或盈余。减少持续盈余最可靠的方法是促进国内需求。宽松货币政策的发挥余地几乎用尽，所以政府应利用低借贷成本，大量投资。首先要做的就是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尤其是教育，以补偿全球化中的输家。对中国来说，如世界银行建议的那样，在医疗上投入更多可能更明智。

国际金融

许多人反对全球化是因为经济还没有完全从 2007—2009 年的金融危机中恢复。这意味着防止同样规模的危机再现是非常关键的。管理者和立法者已经在这方面采取了令人振奋的措施，但是做得还不够。一些国家的银行仍然缺少足够的资金；在另一些国家中，影子银行业对金融稳定形成了潜在危险。许多经济体的总体债务和不良贷款都令人担忧。为了减少金融风险，G20 必须坚持全部经济体在初期实施资金标准，催促其尽快解决不良贷款，并加强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防性信贷额度和央行货币互换组成的国际金融安全网。

税收

由于对跨国公司不缴其应缴的税而产生的不满是另一个削弱对全球化支持的因素。G20 必须发挥其影响力，使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领导的打击避税策略得到成效。

行动计划

G20 能通过在杭州达成一个自愿性行动计划以恢复全球市场的信任，从而从盲目无着中自救。这次峰会尤其是中国的一次机会，即通过帮助制订国际经济领域的新规则来获得更大的影响力，承担相应的责任。中国不应将上述这些步骤视为控制经济的策略，相反，中国的 GDP 从它 2001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起已增加了 6 倍多，如果本土民粹主义者势力上升导致了全球化的倒退，那么中国将会是损失最惨重的国家。

本文原题为“G20 Should Pursue a New Charter for Globalization”。本文作者为英国智库 Chatham House 世界经济专家 Alan Wheatley。本文刊于 2016 年 8 月 3 日 Chatham House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加拿大邀中国共舞

Christopher Sands /文 申劭婧/编译

导读：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于周一离开渥太华，开始对中国的第一次正式访问。这趟旅程对于希望加强双边合作的两国来说都非常重要，而且结果也将对美国，即世界最大经济体和中加两国的战略合作伙伴，产生重要影响。编译如下：

理论上，中加是天然合作伙伴。加拿大是一个资源丰富，出口依赖型经济体，同时也是众多华人聚居地。中国资源贫乏，但是具有广阔的国内市场以及与发达国家结成伙伴的需要。

特鲁多的父亲皮埃尔曾在 1968 到 1984 年间担任加拿大总理。从自身利益出发，他在 1970 年促使加拿大与中国建交，这比尼克松的行动还早两年。最近，特鲁多的前任哈珀因为就中国人权记录问题发表批评意见而一度与北京关系紧张，而哈珀的外交政策一向关注总体人权，但是他指出中国的相关记录在华裔加拿大人中广泛流行。这些华人大多是辛亥革命后追寻孙中山而来，或者是香港回归中国后移民来的。

哈勃还建立了外国资本评估过程，其中包含一个不透明的“国家安全”测试，而这一测试在中国海外石油公司（CNOOC）试图投资加拿大油砂生产商纳克森时被启用。CNOOC 的投资获得批准，但是纳克森长湖工厂早已存在的环境问题使得 CNOOC 的盈利减少。

特鲁多希望这次访问能重塑两国关系，可能的话引导共同投资，旅游业和贸易的发展。他将于 8 月 30 日首先前往北京与总理李克强及其他官员会谈。特鲁多和李克强将重新审视 2012 年双边的外国投资保护和促进协定，并可能开启双边贸易合作的谈判，这一活动早在 1 月就有传言。接下来特鲁多将前往上海会见商业代表，包括阿里巴巴的总裁马云。

上海之后，特鲁多将在参加 9 月 4 到 5 日的 G20 杭州峰会之前访问香港。这一方案处于敏感时期，正好在引发抗议的立法委员会选举之前。作为拥有上千香港移民国家的领导，特鲁多将在这个前英国殖民地地区的政治方面保持谨慎。经济方面，特鲁多将会见富豪李嘉诚，即卡尔加里的赫斯基能源控股人。

中国政府希望特鲁多的访问能带来实质性成果。中国经济已经放缓，习近平政府的反腐败斗争使得共产党和官僚系统动荡不安，商业方面和在中国经营外国公司也受到影响。这使得各方都愈加谨慎，倾向风险规避，可能加重了经济的放缓。

同时，中国因为在南中国海的斗争和与日本的领土争端变得更加被孤立。加拿大对中国来说是重要外交伙伴，不仅同属于 G7 和 G20 成员国，同时也是跨太

平洋伙伴关系（TPF）的成员。尽管特鲁多政府不会在美国之前正式认可 TPP，但是他已经开启了公共协商，并对协议持保留意见。

中国外交的一个弱点是与像加拿大一样中等力量国家的关系，这可以被偶尔与越南、菲律宾、韩国和澳大利亚的冲突证明。作为中等力量国家的典型，与加拿大更好的关系将标志着中国掌握了国际体系中对强权国家来说至关重要的关系类型，这也是美国关注的焦点。

奥巴马总统在本周早些时候将前往中国参加 G20 峰会，他已经与特鲁多有过多次会面——最著名的就是三月奥巴马进行的高调国家访问，前往渥太华参加北美领导人峰会，并于六月在加拿大国会发表演讲。奥巴马和特鲁多关系良好，因此他在 G20 峰会期间将有机会获得特鲁多对中国领导人看法的第一手情报。

中国与加拿大更亲密的关系对美国也有好处，因为这将促进中国在国际体系中与美国紧密的结盟。中国热情招待这位加拿大年轻领导人将向市场和世界资本释放信号，指明习近平的外交政策导向和下一任美国总统与中国合作的可能性。

本文原题为“Canada Reaches Out to China”。本文作者 Christopher Sands 为战略和国际事务研究中心的资深研究员，也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加拿大研究中心的资深研究教授。本文于 2016 年 8 月刊于 CSIS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中国私人投资增速放缓：解读相关官方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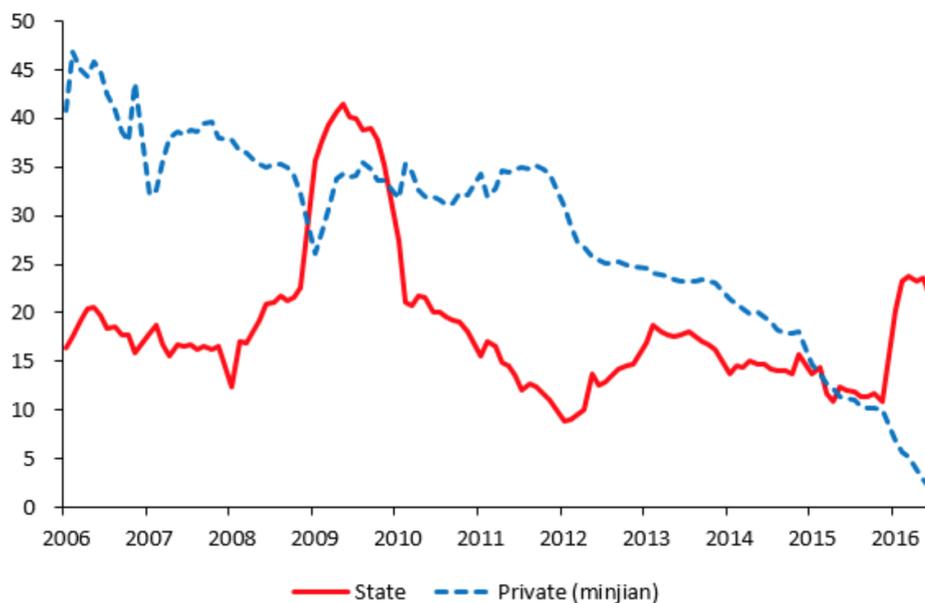
Nicholas R. Lardy, Zixuan Huang / 文 安靖宜 / 编译

导读：2016 年上半年，中国国家统计局的官方数据显示中国的私人投资严重下滑。但是，中国私人投资放缓似乎不像数据显示得那么严重，因为中国将除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之外的所有投资都算做了私人投资部门。然而，2015 年夏季政府对股市调控，使得这种分类方法下的私人投资下滑被过分夸大了。编译如下：

中国国家统计局(China's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的官方数据显示，2016 年上半年，中国国有投资上升，而私人投资显著下降。

Figure 1 Investment Growth

percent



Source: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of China

但是，上图中的数据可能夸大了 2016 年私人投资的真实下滑幅度，其原因是私有企业被分在了“民间”类目。中国政府将之翻译为私人投资，它不仅囊括了私有企业，也包含了其他类型的企业；事实上，它几乎包含了除国有和外资公司以外的所有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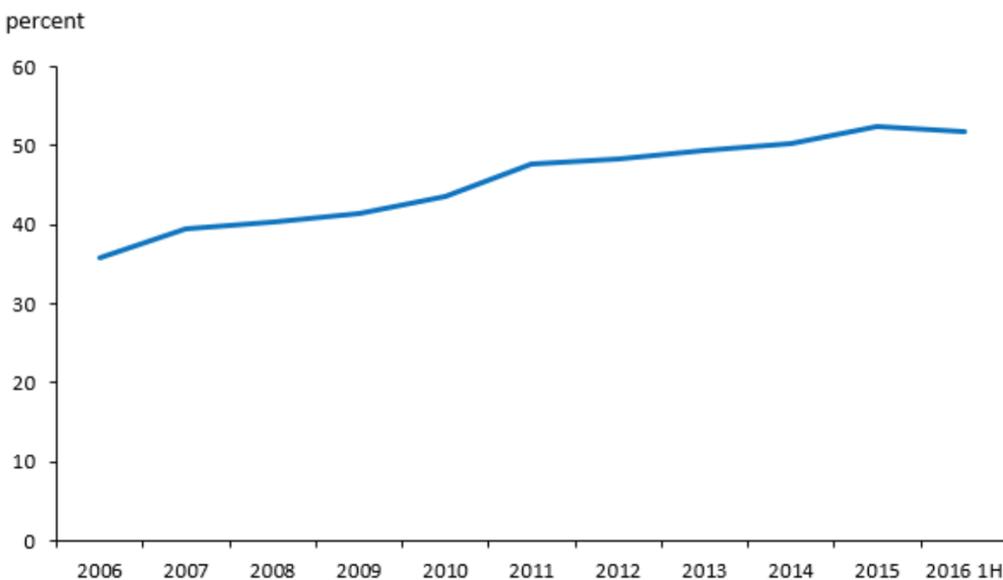
2016 年上半年，国有投资发展迅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府在 2015 年夏季对股票市场的调控。为防止市场崩溃，政府投入了一万亿人民币以上的资金。在此过程中，政府控制了那些从前并非国有的企业。财政部九月的月报显示，国有企业资产大大缩水。其十月的报告则表明，这次缩水主要是因为一些企业的国有控股使这些企业进入了国有企业的类目。但是国家统计局直到 2016 年一月份才在月度数据中体现出这一变化。所以，本年度国有企业的繁荣是真实的，但是

它与之前的数据完全没有可比性，因为它包含了许多新近转入国有企业类目的企业。

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在 2016 年上半年达到了历史最高点，而这部分投资都被记入了国有类目，这也促进了国有投资的攀升。

下图展示了私有企业和私人控制企业被抽走的投资。它表现了从 2006 年到 2011 年间私人股份稳定的提升，意味着这些年间的私人投资已超过平均值。但是 2011 年之后，曲线变得更加平滑。在 2016 年上半年，私人控股甚至少量下滑，这也是十年来这个数据的首次下滑。

Figure 2 Share of investment by private and privately-controlled companies



Sources: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and authors' estimates.

注：2015 年和 2016 上半年的数据估算建立在已注册的私有企业是投资增长的有效指标的前提下。如果大量私人控制的公司于 2015 年转为国有企业，以上的数据就会夸大 2016 年的私人投资。

总的来说，私人投资的增长在 2011 年十分强劲，在 2012 年开始趋于平缓，而在本年度上半年开始下滑。这个问题究竟是否由私人投资领域的产品需求下滑及挤出私人投资的国家政策导致，仍然有待探究。

本文原题为“China Private Investment Softens, But Not as Much as Official Data Suggest”。

本文作者皆为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PIIE) 经济学家。本文于 2016 年 8 月刊于 PIIE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本期智库介绍

The Center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CEPR) 经济政策研究中心

简介：经济政策研究中心成立于1983年。它包括七百多位研究人员，分布于28个国家的237家机构中（主要是欧洲高校）。其特点是提供政策相关的学术研究、并关注欧洲。Voxeu.org是CEPR的门户网站，受众为政府部门的经济学家、国际组织等。它的文章多为与政策相关的工作论文初稿，比财经报纸专栏更为深入，同时比专业学术文章更加易懂。

网址：<http://www.voxeu.org/>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简介：IMF于1945年12月27日成立，为世界两大金融机构之一，职责是监察货币汇率和各国贸易情况、提供技术和资金协助，确保全球金融制度运作正常，其总部设在华盛顿。IMF主要通过监督、贷款以及技术援助和培训三大职能来促成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IMF的工作论文及其他出版物在全球宏观经济政策研究方面拥有巨大影响。

网址：<http://www.imf.org/>

Peter G.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PIIE)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简介：由伯格斯坦（C. Fred Bergsten）成立于1981年，是非牟利、无党派在美国智库。2006年，为了纪念其共同创始人彼得·乔治·彼得森（Peter G. Peterson），更名为“彼得·乔治·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PIIE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10名，全球30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4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1名。

网址：<http://www.iie.com/>

Cato Institute 加图研究所

简介：加图研究所位于华盛顿特区，成立于1977年，是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大型智库之一。加图研究所所以古典自由主义传统为思想根基，致力于“扩展公共政策辩论维度”，通过独立、超越党派的公共政策研究和讨论，旨在“恢复小政府、个人自由、自由市场以及和平的美国传统”。加图研究所的政策分析曾经影响过里根政府和布什政府的政策。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加图研究所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14名，全球30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3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8名。

网址：<http://www.cato.org/>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简介：1964年由美国海军上将阿利·伯克和大使大卫·阿希尔成立。是一个位于华盛顿特区的跨党派的外交政策智囊团。CSIS主要就经济和安全问题，进行政策研究和政治战略分析，其重点放在技术、公共政策、国际贸易和金融、能源等。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CSIS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5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11名。

网址：<http://csis.org/>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Chatham House (Chatham House)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

简介：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成立于 1920 年，位于伦敦圣詹姆斯广场著名的查塔姆大厦内。是目前英国规模最大、世界最著名的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之一。其宗旨是“推动个人和组织对日益复杂多变的世界进行全面研究，并提供政策参考。”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与英国政府、企业、媒体和学术界均有着广泛的联系，对政府的外交政策有一定的影响。在《2011 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Chatham House 在全球（含美国）30 大智库中列第 2 名，全球 30 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 6 名，全球 30 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 4 名。

网址：www.chathamhouse.org/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Innovation (CIGI) 国际治理创新中心

简介：CIGI 是关注全球治理的独立智库，由 Jim Balsillie 成立于 2001 年。它的主要活动包括资助研究、创造交流网络、促进政策讨论、提高多边治理能力。具体而言，它的研究集中于以下四个方面：全球经济、环境与能源、全球发展、全球安全。它致力于将学术应用于政治，通过优秀的研究与分析来影响政治决策。

网址：<http://www.cigionline.org/>